

手表决。以这种方式产生的结果，往往越是关键之处，越不民主。例如：在是否撤换广场问题上，便始终是少数人“作主”，任何人都可因一点点小错而提议举手表决罢免学运领袖，因而破坏了领导的稳定与统一。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由于对于“民主”的肤浅理解，使广大学生将“民主”作为一种完美的理想进行献身性的追求，而认识不到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乃是要使积极的妥协制度化、法律化，从而将社会中贪婪的掠夺和残酷的斗争限制在最低限度；民主作为一种社会的组织形式，乃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政治，对社会权力的实施者进行有效的监督；民主作为一种解决分歧的程序，乃是使所有的利益集团在能获得一定利益的同时，都绝不可能完全满足自己的欲望。

将民主作为一种完美理想去追求，而不是作为一种制度去争取的必然结果，是看不到已经取得的重大进展，认识不到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生存”——当然是指斗争双方的生存——是永远不可放弃的第一原则，积极的妥协是最终实现民主制度的唯一途径。以致采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革命斗争形式。事实上，不论是哪一方，完全达到目的而“罢休”之日，便是“专政”开始之时。因为完全压倒对方本身，便是专政；也只有专政，才能使斗争的一方在另一方完全失败、一无所获的前提下，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

伟大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悲壮地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却永存。它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转型中的工人阶级

《转型中的工人与民主运动》

王绍光

【内容提要】

学生和知识分子在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已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这次民运的另一特点——广大的工人的同情、支持与参与——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自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工人大规模直接参与民主运动还是第一次。工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这次民运？他们的要求与其他社会集团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站到了一起？为什么他们没有象波兰工人那样组织得更有力量？工人的参与对调整民运的目标及战略有什么启示？这些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社会上就存在着两大对立阶级：干部阶级（或用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Szelenyi的话说，“再分配阶级”）和工人阶级。仅仅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没有相应地建立民主制度并不能避免在社会生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新的阶级对立。但是在文革结束前的近三十年中，有两个因素使这种基本阶级对立模糊化了。一个因素是对阶级成分的过分强调，另一个因素是当时经济发展的方法造成的所有先进与落后分子之间的矛盾。文革结束以来，这两个因素在中国社会里的重要性已经或正在消失。因此，干部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便显得突出起来。参加民运，是工人阶级正在觉醒的标志。

译者注释

《八九民运与中国经济》
华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0

于五月十九日晚宣布戒严才没有成功。⁴

五月下旬，独立工人组织开始出现，运动也开始波及到外地。五月二十五日，北京成立了“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委会”。不到十天，至少在上海、武汉、广州、南京、兰州、贵阳、昆明、杭州、西安、长沙、西宁等省会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组织。如果不是当局的血腥镇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组织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得到了广大工人的同情、支持和直接参与。尽管中外报章对工人在以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报道十分零碎，但工人正在觉醒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月二十七日，当北京学生发起第一次大游行时，工人和其他市民的助威是使这个行动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对学生的支持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对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讲话和对《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感和蔑视。

进入五月，工人队伍不稳的迹象越来越多，使当局惊恐不安。五月初，北京市委对各工业企业提出了五项要求，十二条措施。内容具体到“见到学生进工厂就轰出去”，“见传单就撕”，“不准给游行学生送水”等。五月十三日，为安抚工人，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与北京工人代表进行了座谈，李鹏也赶到首钢对工人进行笼络。五月十五日，北京市委又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如何“稳定工人，严防工人上街”。但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是徒劳的。

五月十七、十八日，当首都各界百余万人连续两天游行，声援绝食请愿学生时，工人队伍格外引人注目。几乎全市所有大小工厂都有人上街，其中又以产业工人为主力军。但这两天却有人举着“首钢人来了”的大幅标语参加了游行的行列。另外，燕山石化公司、北京重型机械厂、北京内燃机总厂、北京焦化厂、北京机电总厂、北京起重机床厂、北京丝织总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北京计算机床厂、北京电子管厂、北京核仪器厂、北京化工二厂、北京三露厂、北京第三、四、五建筑公司等大型企业的工人也举着“工人誓作学生的坚强后盾”、“救救孩子”、“铲除腐败，打倒官倒”、“为了民主，不怕开除”、“为国为民，不要奖金”等标语前来声援。⁵

与此同时，工会组织也分外活跃。许多厂的游行活动就是由工会组织的。五月十七日全国总工会下属的工人运动学院数千人高旗到天安门广场游行；五月十八日全总向绝食学生捐款十万元。这在官方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另据透露，全总曾准备发起全国总罢工，只是由于

五月下旬，独立工人组织开始出现，运动也开始波及到外地。至少在上海、武汉、广州、南京、兰州、贵阳、昆明、杭州、西安、长沙、西宁等省会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组织。如果不是当局的血腥镇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组织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工人对民主运动的同情、支持和参与也可以从当局处理这一事件的做法上看出来。一九四九年以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工人总是被动员充当先锋。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自不必说，五七年反右时，报纸上最有威慑力量的文章是“工人阶级说话了”。文革是以工农兵齐上阵，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发端的。七四年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第一篇文章就是“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直到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用的还是工人民兵。四五运动被压下去以后，工人还被动员上街“声讨”反革命。这一次情况却大不相同。四、五月份民主运动高涨时，当局没有能耐挑动起工人对学生、知识分子的反感；六·四镇压用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连警察都不信任，更不用说借用工人力量了。民运压下去以后，报刊上见不到过去那种借用工人名义、千篇一律胆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浪潮，当权者也不敢组织工人上街表示效忠。工人阶级这次为什么没有按照当权者的调子出来“说话”呢？唯一的解释是当权者连胁迫工人的勇气和能力都丧失殆尽了。

当局对工人卷入抗议运动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恐惧远远大于对学生、知识分子的恐惧。这不仅表现在李鹏、赵紫阳会见工人、学生见学生的先后顺序上（五月十三日会见工人代表，但迟至五月十八日才见学生代表），也表现在当局对工人、学生活动分子镇压的先后顺序上。北京工自联预定五月三十日正式成立，但就在这一天，工自联筹委会宣传部长沈银汉、常委白东平、钱玉民被秘密逮捕。很明显，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工人象学生一样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使局面进一步失去控制。值得注意的是，“高自联”成立时，当局并未采取类似的措施；而对民运的全面镇压是几天后才开始的。

当局为什么对工人特别恐惧呢？道理很简单，第一，工人人数众多。在中国一亿五千万非农业就业人口中，工人有八千三百万，占总数的60%；如加上商业、服务业职工，人数达一亿零五百万，占总数的70%多。而所有文化、专业、技术人员加高校学生、研究生总数还不到三千万；其中高校学生加研究生总共不到二百万。第二，工

其他社会集团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工人阶级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发展中，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人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工人一旦闹事，生产就会停顿，整个国家就有可能瘫痪。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历代统治者似乎都很相信这一点。但是如果工人闹起事来，天下就会大乱。对中国当今的统治者来说，波兰团结工会就是可怕的先例。

一向与政府合作或至少显得安分守己的工人为什么不那么安分了呢？从一九七八年的“北京之春”到一九八六年底的学潮，历次民运中工人态度都不甚明朗，为什么这次他们要站出来表态呢？他们有什么要求？这些要求与学生、知识分子的要求一致吗？如果不一致，什么是共同点、什么是不同点？下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

工人直接卷入政治风波，标志着中国的阶级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中国的阶级关系曾发生过一次重大变化，其标志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随着农业合作化和城市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更确切地说，国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按当时的理论，废除私有制以后，社会上只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对抗性阶级关系已不复存在（后来毛泽东的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注重的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结构上的问题）。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推断：阶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生产关系又被归结为所有权关系；既然私有制被消灭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都一样，对抗的阶级关系当然就不存在了。

这种说法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也经不住实践的考验。从理论上讲，生产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生产资料的法律意义上的所有关系。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定义，生产关系至少还包括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分配关系。而四九年以来，尽管在法律上工人和干部都被称为“国家的主人”，他们在社会生产、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却十分不同。干部有权支配生产资料及其他社会资源，工人只有服从的份。在现代化大生产中，上下级关系也许难于避免，但在所谓“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外，必须建立一套约束生产资料控制者（即干部）的机制。否则“工人当家作主”只

能是一句空话。换句话说，民主应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民主，没有对当权者的有效制衡，即使消灭了私有制，生产过程中的上下级关系也会演化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种不平等关系也是一种对抗性的阶级关系。如果我们把私有制下的阶级关系称作财产阶级关系，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阶级关系也应被称为财产阶级关系。

依作者的看法，自四九年以来，中国社会中就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干部阶级（或者可用匈牙利哲学家Szelényi的概念“redistributors”，即再分配阶级）和工人阶级。由于权力集中于干部手中，工人没有民主参与的机会，下级不能制约上级、干部以权整人是个普遍现象。加之公民的基本权利（civil rights）没有保障，不满很难找到宣泄的渠道。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是，一旦有机会不端就会激烈地爆发。文革就是表现之一。但文革以前，有两个干扰因素使干部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关系显得十分模糊。一是对所谓“阶级成份”的强调，二是干群中形成的庇护—受庇护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成份是社会结构中已消失了的阶级关系的影子。但是由于几十年如一日的强调，成份显得比社会结构中现实存在的阶级关系更真实。红五类、黑五类的划分把工人和干部归为一类，从而模糊了工人对干部阶级的认识。
从庇护—受庇护关系，是以动员方法促进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为鼓励工人努力工作，工人被划分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积极分子是领导的红人，落后分子在政治、经济待遇上受到歧视。这样不仅分裂了工人队伍，而且进一步妨碍了积极分子和大量中间分子认清他们与干部阶级在结构上是处于对立地位的。

这两个干扰因素的影响在文革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大量证据表明，“成份不好”的人和所谓“落后分子”倾向于变成反派，而成份好的和积极分子倾向于变成保守派，保受到攻击的干部。毛泽东不理解为什么工人阶级内部会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事实上，正是他在文革前推行的政策导致了这样的结局。
从文革结束以后，这两个干扰因素的重要性已在中国社会中逐渐消失。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摘了帽。生产发展中的动员方法已被物质刺激方法所替代，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的区分已失去了意义。

人们的社会属性不再由其自身或父母在一九四九年前的阶级地位来决定，也不再由其政治表现来决定。决定他们社会属性的就是他们在现

同时奖励制度得到全面恢复。但是政府很快发现调工资、发奖金的效果并没有最初预想的好。这样干部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的对抗性就较容易看清楚了。

三

在现实生活中，干部阶级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干部阶级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干部权利在制度上历来是不受自下而上制约的。以前对干部的唯一制约机制是“运动机制”。这个机制有几个特点：第一，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四九年以来，没有一个政治运动是群众自发兴起的；第二，运动的对象主要是有政治偏向的干部和以权谋私的干部；第三，运动通常借用群众力量；第四，对运动对象的处置通常是非常严厉的。由于每隔几年就会来一个运动，干部以权谋私的情况受到了相当有效的遏止，尤其是在中下级。文革后，中央宣布，再也不得不稍动了，而同时又没有建立对干部自下而上的制约机制，这就使得不少干部肆无忌惮起来。他们不但以权整人，而且物欲横流，以权谋私，使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从八〇年以来，最高当局几次发动整党，试图消除不正之风。但每次整党的结果都是不正之风愈刮愈烈。摆在最高当局面前的有两条途径：一是恢复运动机制，以运动的严酷性威慑官污吏；一是给人民以民主监督权，从制度上置各级干部于人民监督之下，使之不得不奉公守法。但看来，这两条路当局都不愿意走。对他们来说，运动太难控制，搞不好会闹得天下大乱。尤其是作为文革的牺牲者，提起群众运动，他们还有余悸。还政于民，也不是好选择，因为这样做意味着他们自身的权力也会受到限制。最高当局患得患失、孜孜于一己私利，在客观上纵容了腐败现象。而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自然引起了作为受害者的工人的强烈不满。

二、近年来的改革使工人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日益降低。

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通常都着眼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期缩小社会差距，缓和阶级矛盾。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般都着眼于社会生产，其目的是提高效率。

为了提高效率，中国改革领导人首先想到的是恢复和扩大物质刺激机制的功能，以动员促生产的方法逐渐被弃而不用了。从一九七七年十月起到一九八三年底，国家先后五次较大范围地调整了职工工资，

同时奖励制度得到全面恢复。但是政府很快发现调工资、发奖金的效果并没有最初预想的好。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奖金和计件超额工时费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点六，工资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一。而同期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一七点九；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一；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二；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二。⁹ 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情况是难以持续的。

一九八四年城市改革正式全面铺开。几年来企业改革的各项措施贯串着一条主线，这就是扩大经济阶层的权力并使他们对工人更加严厉。从厂长负责制到劳动制度改革，从对小企业的租赁、出售到对大中企业的承包，这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做的结果与农村改革不同。经理不象农村干部，他们的权力不会是随改革缩小了，而是大大扩展了。与此同时，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地位却没有相应提高。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厂长们多数依靠严厉的经济惩罚和行政制裁来硬性管理工人，以至于滥用职权。职工们处于“无权控告”、“接管受罚”的地位。一部分厂长利用手中掌握的3%的晋级权随意扩大干部的晋级面。有的厂长在工作、工种、住房安排上千方百计地照顾自己的亲朋好友，无视工人的实际困难。还有有的厂长听不得相反的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打击报复向其提意见的职工。¹⁰

企业的租赁、出售、承包、兼并问题更严重。首先，这些安排全是政府推动并一手包揽的。工人对关系自己命运的大事毫无发言权。租赁、出售、承包以后，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者以老板自居，开口闭口“这个厂是我承包的，一切都听我的”，完全无视工人的权利。¹¹ 这些变化使工人与经理关系日趋恶化。全国总工会八六年对上海四十六家企业约四万三千名职工的抽样调查显示：有39·4%的职工认为企业目前的干群关系“不如以前”，34·5%的职工认为“没有变化”。¹² 八七年七月体质所对二千四百五十人的调查也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干群关系”越来越差。¹³ 到八八年底，一项新的调查发现，只有25%的人认为干群关系的状况好或比较好，认为不好或很不好的人已达到75%。¹⁴ 这些调查明白无误地表明，职工群众和厂长间的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且这在中国企业界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了。

三、近年来的改革使工人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日益降低。
由于完全处于被支配地位，工人对工作失去了兴趣。“按酬付劳”、

懒散、怠工、浪费成了一种传染病，在中国企业中蔓延。八六年全国总工会对六十四万职工的调查发现，一半人回答说，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发挥得不充分或很不充分。八七年上海经济发展研究所对一千名上海职工的问卷调查发现，有 9.4% 的职工认为大多数职工心目中存在着“给多少报酬干多少活”的想法，并有 60.3% 的职工认为这一想法是合理的。只有 25% 的人认为不合理。经理阶层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八八年夏对一百名经理的问卷调查表明，89% 的经理认为，现在职工的精神面貌不如以前。¹⁴ 由于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八九年五月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不止一人呼吁，当务之急是扭转职工中的“主人翁失落感”。¹⁵ 工人失去工作的积极性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如果某项改革措施的结果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这项措施肯定是不是合理的。¹⁶

2、对经理个人进行报复。

曾以推行“满负荷工作法”名噪全国的厂长张兴让，收到不少工人来信，骂他是“半夜鸡叫”里的周剥皮，损害工人利益。这种口头攻击是最简单最常见的报复形式。¹⁷ 严重的报复经常会引起肉体伤害，甚至采取恐怖主义的形式。据辽宁省有关部门统计，八八年一月至七月，全省企事业单位内部发生的威胁、殴打、伤害领导人事件共达二百七十六起，被伤害的领导人二百九十七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平均每个事件中被伤害的领导人多于一人，这也许暗示攻击者常常也多于一人。同时，沈阳市对一百名经理调查，其中曾受过威胁和恐吓的达五十四人。在沈阳震动最大的是王淑琴事件。王淑琴是沈阳人民旅社经理，被誉为“优秀女企业家”。她被本社职工李丹用刀砍死。除此之外，沈阳还有一名厂长和另一厂长的妻子被杀，但两起案件中的凶手尚未抓到。¹⁸ 有时经理被杀，甚至会有工人叫好，说是为工人出气。¹⁹ 由此可见，工人与经理间的对立程度有多么严重。

3、罢工。

近年来，怠工、停工、罢工事件时有发生，主要原因是由企业内部分配问题、职工民主权利问题以及劳保福利待遇问题。八八年中，罢工事件急剧增多，不到年底，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已发生罢工事件七百余起。这个统计也许是保守的，因为罢工事件通常就地处理，地方领导不愿家丑外扬，能不上报就不上报。这些报到全国总工会的事件恐怕都是事态严重到了一定程度后不得不上报的。八八年的罢工中，参加人数最多的是二月发生在浙江萧山第三麻纺厂的罢工，共有一千五百名工人持续罢工两天。持续时间最长的是西北医疗设备厂。

自八七年十二月下旬起一千一百多名职工罢工达三个月之久，致使八八年一季度该厂的产值、利润为零。罢工是有组织的行动。罢工事件的增多意味着工人已逐渐认识到组织的重要性，并已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虽然这些组织大多数只是临时性的，罢工结束后，组织就会散掉，但在集体行动中形成的领导人、利益认同、非正式联络网都会为以后的集体行动铺平道路。

工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下降是相当敏感的。尽管官方的媒介仍成天价大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工人们自己很清楚这只是糊弄人的陈词滥调。工人中广泛流传着一句民谣：“老大打了蔫，老二分了田，老九光着屁股上了天。”八四年到八七年四年间，全国大中小城市的总工会在工人中进行了大面积的问卷调查，平均有 5.6% 的工人反映，中国工人的国家主人翁地位下降了，工人利益受到损害。²⁰ 越往后，工人的这种感觉越强烈。八七年下半年，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城市发展课题组对三十三个城市中三千名居民的调查揭示，工人中有 7.6% 的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由“老大”变为“老末”，因为他们既没有权，也没有钱，更没有教育，有的只是体力上的支出，因此不受重视。更近的调查发现，有 8.3% 的工人认为改革中工人地位相对下降，生活提高不快。²¹ 关于工人地位下降，不仅工人自身有切肤之痛，其他社会集团的人也承认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上引社会研究所城市发展课题组的调查发现，人们在排列改革中收益最大的顺序时，工人被排在最后一位。另一调查以“对社会上流行的以下看法您是否赞同”为题询问被调查者，由此得到两组数据，一组是自我评价，另一组是对其他社会集团的评价。他们的发现如下：

	评估其他集团			自我评估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知识分子名声好听实惠不多收入低	50.3	48.1	86.9	13.1		
工人地位相对下降生活提高不快	72.4	26.0	83.0	14.8		
商业服务人员工作忙责任大收入低	46.9	50.5	73.9	24.2		
中小学教师辛苦无应有承认收入低	63.6	34.2	93.1	6.9		
个体户发财致富许多靠歪门邪道	63.1	35.1	16.8	81.6		
干部以权谋私有不少实惠	72.7	25.7	64.3	34.0		
这几年农民富得快收入比工人高	69.3	28.5				
干部奖金太少收入不如工人高	40.0	57.8	55.5	42.9		

这里我们看到，各社会集团的自我评价往往与别的社会集团关于它的评价有一定距离。但对“工人地位下降，生活提高不快”两者差距最小。

工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不满远甚于其他社会集团这一点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来。当问到是否希望改变自己职业时，上述调查在最倾向于改变自己职业的各社会集团中，工人排列第一。被调查工人总数的 62·9% 希望改变自己的职业，而中小学教师中只有 55·4%，文体工作者中只有 53·8%，党政机关干部中只有 50·4%。²¹

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改革中发生了负向位移，工人的不满首先是对他们的顶头上司，这也就是出现工人丧失劳动积极性、对经理个人进行报复及怠工、停工、罢工的原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工人地位下降不是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也不是个别专横霸道经理所能造成的。不满开始渐渐集中到推动种种对工人不利的改革措施的政府头上。不少工人说，“政府对社会各阶层都有一些优惠，唯独对‘主力军’刻薄，现在工人是‘被遗忘的人’，好处得不到，变着法儿整治工人的招儿倒不少。住房改革、扣罚制度、公费医疗改革等等，哪一样不是冲着工人来的。”²²

据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经济日报》透露，一种叫做“职工危机”的传染病正在企业职工中蔓延。其主要表现是成天忧心忡忡，害怕在优化劳动组合中被“炒鱿鱼”。这种职业生存危机与各大城市街头出现的抗议行动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工人中的职业危机感并不是杞人忧天，空穴来风。威胁是现实存在的。

一九八六年下半年通过了关于劳动制度改革的四个文件，其后又通过了《破产法》。从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看，这些措施似乎是非常必要的。但实行这些措施会带来什么负面的后果，怎样对此进行补偿似乎不在当局的考虑之列。

按照这些规定，对新雇佣的工人实行合同制。合同制工人不仅聘期是有限的，而且享受不了工人们以前享受的许多福利。合同制工人自然对自己的前景不乐观。他们有五个最担忧的问题：1、合同期满，谁来不能续约，失业；2、生了病特别是致残或得了大病怎样医治，谁来照管；3、四十年以后，最佳年龄一过，工厂不要，谁还欢迎；4、老了谁来养活？靠企业提供社会保险费，一旦破了产怎么办？够不够

生活？5、女工担忧更多，结婚给不给住房？生了孩子企业不续订合同，生活怎么办？

对工人最严重的威胁是失业，或更确切地说是被解雇。四九年以來政府一直试图实行充分就业政策，但自六十年代以来就存在着新增劳动力的“待业”问题，而已经在业的人员被解雇则是近年来的新现象。

在最早实行所谓“优化劳动组合”的青岛市，五百多个企业一下子减掉了一万零八百名工人。同是试点城市的湖南株洲市共有二十六万职工，进行组合后也有四万人失去了工作。点上的经验很快在面上推广开来。八七年湖北省国营企业一年内辞退除名一万四千名国营企业固定工，到八八年夏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已有三万八人为失业救济金领取者。据新华社八八年八月公布，全国至少有三十万名国营企业固定工人被从原来的岗位上撤下来。这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小开端。《人民日报》披露，据估计全国有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人隐失业，还威胁说要从严实施《破产法》。头脑再简单的工人也能体会到这些说法的含意。何况政府还不断把最新的实例摆到工人面前。例如拥有二百万职工的沈阳市，政府决定在几年内把三十万冗员从企业中剥离出去。仅半年时间里，占全市一半的九百多家企业实行了劳动优化组合，到八八年六月已有六万人失业。据说连赵紫阳也为其进展之神速而感到惊讶。如果全国企业都效仿沈阳，成百上千万工人就会被抛上街头。

失业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现在一般规定被优化组合刷下来的人，头半年留在厂内劳务市场，没有奖金，拿原基本工资的 50—60%（有的地区只发三十元生活费）。六个月以后如不被厂里组合，或没能“跳槽”，便正式办理离厂手续，去街道领取失业救济金，一般为一年，最多不超过两年。此后便听天由命了。中国的福利是随单位走的。有单位就有公费医疗、退休金等各项待遇；离开了单位，这一切便都没有了。社会保障制度是改革中被遗忘的角落。这样一旦失业，不仅没有了工资，也没有了公费医疗，退休金。上海一女工失业得不了白血病，住院要交五千元预备金，她家拿不出，便求助于原工厂。工厂说，按规定，她失业后已经和厂里断绝了联系，我们管不着。求助于劳动保险部门，人家说，她不属于终止合同或被辞退者，不在我市救济之例。民政部门说，她不是孤寡残废，我们管不到。市总工会说，她是工会会员，也许我们该管，可要拿出很多钱，我们又管不起……。这个女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病情一天天恶化。一些工人听说这

件事，心情十分沉重，他们说：“看看别人，想想自己，真叫人不寒而栗。”

失业工人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老工人说：“共产党一开始闹革命就讲‘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怎么现在变了挂？”青年工人则说：“现在是半边道理，企业有权辞退工人，而工人无权挑选手业和厂长。工人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不少人将愤懑诉诸于直接行动。在优化劳动组合试点城市株州发生了四起罢工事件。在湖北，一群失业工人到公安机关申请上街游行。游行的口号是：“我们要活命，我们要吃饭。”²⁵ 这使人们想到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的名言：“人们都有个肚子，不管是清洁女工，医生，工程师，还是其他什么人，都要吃饭……既然所有的人都要吃饭，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应该一样——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真髓。”²⁶ 在自称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家，一部分工人的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人们当然要问，优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八七年、八八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对未来生活保障的担忧已成为近年来一大社会心理问题，人们开始把“有保障的生活”放在各种需求的第一位，而且强度不断增加。同时这些调查还发现这种担忧更多地集中于工人群体。这说明近年来某些改革措施在工人中引起的不安有多么广泛，多么强烈。

四、物价飞涨，使相当一部分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
关于通货膨胀的报道和分析已经很多了，在此不必赘言。我们只看看几组数据。

关于物价上涨，中国的统计资料提供两个数字，一个是零售物价总指数，另一个是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七八年零售物价总指数平均每年只递增0·7%，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除八〇年(6%)以外每年上涨不到3%。而八五年是8·8%，八六年是6·0%，八七年是7·3%，八八年是18·5%。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八四年平均上升不到1·6%。而八五年是11·9%，八六年是7·0%，八七年是8·8%，八八年达20·7%。

职工的实际工资改革头三年有较大增长。七八年6·1%，七年6·8%，八〇年5·9%，从八一年到八三年增长减缓，八一年-1·0%，八二年1·2%，八三年1·4%。八四年城市改革正式全面展开，职工的实际工资来了个大飞跃，上涨14·9%。但好景不长，从八五年起，情况一年不如一年。八七年只增长0·9%，八八年只增长0·5%。借用布鲁斯评论六十年代波兰实际工资增长

率的话说，八七、八八年对中国职工实际工资增长率在统计上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还没超出计算误差的限度。何况这还是官方的统计数据，实际情况大概更糟。²⁵

物价飞涨，使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家庭实际收入水平下降。据官方自己承认，八六年“有少数家庭”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八七年增长到2·1%的家庭，即每五家中有一家；八八年更增加到3·4·9%的家庭，即每三家中有一家生活水平绝对下降了。²⁶ 到底是那些家庭生活水平下降了呢？官方的统计资料没有按社会集团分别给出数据。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工人家庭首当其冲。一九八六年，一项对北京、广州、武汉、成都、青岛、长春、西宁、芜湖八城市的“物价心理反应”调查发现，人们的收入越高，经济承受能力越强，对物价改革表示赞成的越多。同时，它又发现人们对物价改革的态度最为消极。行政干部赞成物价改革的人数比例为5·7%，知识分子为5·2%，个体劳动者为4·9%，销售服务员为3·6%，无职业者为3·4%，而工人只有2·8%，比干部和知识分子低一半，甚至低于无职业者。我们也许可以推论工人之所以如此消极是因为他们收入不高，经济承受能力不强。这还是八六年的数字，当年的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只有7·0%，而八八年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增长是20·7%，为当时的三倍。如果当年许多工人对物价改革的后果即物价上涨感到承受不了的话，那么他们八八年的日子一定更不好过。因此，说工人家庭是通货膨胀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大概离现实距离不会太远。²⁷

研究革命和社会冲突的理论早已注意到，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大幅度改善以后，如果突然由于某种原因终止的话，就可能引起动乱。遥远的法国大革命不必说了，波兰的团结工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一九七〇年戈穆尔卡下台以后，吉尔卡(Gierek)采取了快速推进战略。头五年这个战略看似相当成功，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但当政府不堪沉重的物价补贴负担，决定于七六年六月提高食品价格时，马上引起了工人罢工。工人并不因前几年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得更能容忍物价上涨。相反，持续几年的好日子刺激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七十年代后半期，波兰经济进入衰退期，人们的期望与现实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终于在八〇年引发了受到广泛支持的团结工会运动，工人阶级在这场革命中担任了主力军。中国近十年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与波兰七十年代的经验十分相似。八五年有8·4·5%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此后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提高的比例连年下降，到八八年涨价狂潮以前已降到4·6·5%。²⁸ 八八

年七月以后，由于政府武断地做出要调物价的决定，结果引起物价飞涨，全国出现了抢购、挤兑的狂潮。虽然官方统计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是 20.7% ，但不少专家估计，物价上涨幅度可能高于 40% 。进入八九年情况并未好转，头六个月全国零售物价比上年同期上涨 25.5% ，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涨还要高。³² 物价如此直线上升的结果一定使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提高的人比例跌到一个更低的百分点。前几年激发起来的期望面对这样冷酷的现实变成了深深的失望。对现实失望的人卷入抗议行动是不足为怪的。

五、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

一部分人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富了起来，而且富得没道理。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暴发户。他们抽洋烟、坐洋车，回家则攀登私宅，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他们之中包括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倚仗家势的高干子弟，无法无天的个体户以及部分承包企业的经理。通货膨胀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怕的陷阱，对他们来说却是黄金机会。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人便先富了起来，而且富得流油。其奢华生活方式与亿万成日为生计精打细算的平民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引起了人们严重的关切。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有这样一项调查：对十五万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表明一九八七年处于收入第五等级（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收入为 122.8 元）的人生活水平比处于第一等级的人（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收入为 36.5 元）高 3.4 倍，而一九八四年前则只有后者的 2.8 倍。³³ 他们通过对周围人的观察也能发现触目惊心的社会不公现象。体改所八六年二月第一次对公众不满状况进行调查时，对收入不平等的不满居十三项不满的第八项。而八七年四月的调查发现对“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的担心已成为城市居民最担心发生的社会现象中第五项。到八八年四月，更上升到第四项。³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的调查发现， 88.7% 的人感到收入差距过大。³⁵ 这里提一提波兰情况也许是有所启示意义的。一九八〇年八月一项波兰舆论调查报告指出：“对政府信心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不满。”当时发现 85% 被调查者认为波兰社会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很大或太大”，比中国的百分点还要略低一点。波兰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也是政府弄平等求效益的直接结果，而不平等扩大的后果则是八〇年团结工会的崛起。³⁶

最初人们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个体户身上。他们认

为“改革便宜了二道贩子”，对个体户这个阶层也持否定态度。全国一千二百万个体工商户中，据估计年收入在万元以上的占 10% 左右，其中占 1% 的雇工大客户年收入可达数万元、数十万元、以至数百万元。例如在广州，家产百万元的私营企业主有几十人，其中最大的业主有资金四百万元，雇工近四百人。³⁷ 不少国营职工抱怨说，“我们贡献不少，可是收入却远不如个体户。”他们的不满反映在一些广为流传的民谣中，如“上班穷，下班富，开除就成万元户”、“上正中歪下乱来，勤劳懒富官发财”、“富了投机倒把的，苦了奉公守法的，提了溜须拍马的，奖了弄虚作假的”、“无法无天暴发户，不三不四万元户，老老实实困难户。”

最近一两年人们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渐渐集中到所谓“官倒”们身上。的确，个体户与官倒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些干部及他们的家人子女利用手中的职权，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单凭打几个电话，批几张条子，便可日进斗金。人们对官倒的不满进一步导致了对邓小平的不满。因为一方面邓小平的路线为官倒大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邓小平及多位最高领导人的子女也卷入了官倒，至少人们是这样认为的。民谣也反映了这种不满，如“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刘少奇的儿子去支边，周恩来没有儿子拼命干，邓小平的儿子去募捐，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胡耀邦的儿子不露面；”“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华国锋的干部无影无踪，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以及对《东方红》的改编：“西方红，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小平”，他为特权谋福利，呼儿嗨哟，他叫咱们各顾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开始拿邓小平与毛泽东相比，并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怀念。为什么会这样呢？显然，人们怀念毛泽东不是怀念他的“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是怀念“大跃进”，不是怀念“文化大革命”。他们怀念的是一种平等主义的理想。一位汽车司机说得很明白：“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那时提倡均富，这并不是大锅饭，只是贫富均等。但现在那些当官的有钱，贫民百姓生活艰苦，贫富差距之大没有办法形容。北京现在有句话叫‘清除贫富’，毛泽东时代就没有这些话。”³⁸ 怀念毛泽东的是什么人呢？在五月抗议高潮中，正是工人高举毛泽东的画像，而不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个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

把八九年工人广泛同情、支持和参与抗议运动这一现象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它是中国社会结构中干部—工人阶级关系自文革结束以来发生重大转折的产物。邓小平路线消除了以往模糊这两个阶

级间对立关系的干扰因素。工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与干部阶级的对立是第一位的，而工人内部的差异、分歧是第二位的。³⁹

导致工人参与抗议运动也有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上面谈到的干部腐败，工人社会地位下降，他们的生活保障受到严重威胁，物价飞涨以及不平等日益扩大等社会危机现象。与社会危机相伴随的是合法性危机和参与危机。这里的合法性危机有三层意思：第一，工人认为政府应为社会危机负责（确定抗议对象）；第二，工人开始认为声称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邓小平政府并不是他们的利益（怀疑政府的动机）；第三，工人对政府是否愿意和是否有能力解决社会危机信心越来越低（怀疑政府的能力）。参与危机是指，工人的不满找不到制度化的渠道宣泄。工人没有办法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许多人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工人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也不关心争取民主。而最近一项调查表明工人中能正确指认民主概念的人比其他社会集团都来得高。

公民对民主的认知 (%)

	公民 总体	工人	个体 劳动者	知识 分子	干部
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广泛听取征求人民意见	24.98	19.60	11.76	21.39	39.72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19.45	24.00	26.89	16.24	18.12
少数服从多数	11.58	16.00	10.92	6.96	6.97
为民作主	5.17	3.20	3.36	4.64	3.83
人民能够选举政治领导人	10.92	16.40	18.49	10.31	5.57
人民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	6.55	10.00	5.04	8.51	6.27
限权分权	10.85	2.00	6.72	20.10	12.20
其他	3.35	1.20	1.68	6.44	4.18
不知道	0.87	0.80	1.63	1.03	0.70
	6.26	6.80	13.45	4.38	2.44

同一调查还表明工人中能对中国目前民主现状作出正确评价的人也比其他社会集团比例高。工人中有 19.22% 的认为“中国目前最缺乏民主自由，实现民主自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个体劳动者中只有 11.97%。⁴⁰

工人中不仅有较大比例的人对民主概念和中国民主现状有正确的认识和估计，而且他们也有参与的较强愿望。当然他们期望参与的层次与某些知识分子不同。知识分子倾向于把舆论监督作为自己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所以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的主要要求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而工人则倾向于把着眼点放在经济民主上，其主要参与方式（在正常条件下）是参加企业管理。面对权力日益膨胀的经理阶层，工人参与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据全国总工会调查，职工中希望参加企业管理人员的，八三年只占 2.3%，八六年已增至 4.1%。⁴¹但是由于邓小平政权只关心经济效益，不关心工人利益，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愿望很少得以实现。不仅如此，工人的权利事实上越来越得不到保障。例如八八年年下半年在广西对四十三家企业调查发现，有 5.4% 的工人认为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了侵犯。⁴²

本应代表工人利益、对经理行为进行制约的工会组织事实上不能起到这个作用，而是成了行政领导的御用工具。工人由此自然产生了建立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的要求。这种工会在企业内要能代表工人与经理交涉，限制经理权力，保护工人利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影响政府的宏观决策。工人的这种要求曲折地反映到了八八年十月召开的工会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召开这个大会是因为邓小平政权看到各地工人频频闹事，生怕酿成大祸。会前邓小平要求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除身体状况实在不佳的以外，一律出席大会并接见代表，以安抚工人这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会上赵紫阳作了长篇讲话，试图说服工人以生产为重，接受经理的一元化领导。但选举下届全国总工会理事会时，代表们表现出极大的不合作。代表们普遍认为倪志福任期期间象绵羊，不能代表工人利益，因此不想选他当主席。邓小平却希望倪志福这种听话的人留在那个位置上。他派徇明复几次三番对代表作工作，并打出邓小平的招牌胁迫代理人表选倪志福。但倪志福最后只得了 1287 票（全票 1487），远低于许多不太知名的劳动模范。前江西省省委书记万绍芬，尽管中央力保，只得 1080 票，终于落选。在宣布选举结果时，江西代表首先鼓掌庆贺，其他代表也附和鼓掌。由中央推荐的朱厚泽同样也受到了代表们的怀疑，他也是勉强当选。⁴³ 在官办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民主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人民当家作主，工人中有 1.6% 的人正确地指认了这个概念，而知识分子中能正确指认的还不到 7%，低 9% 还多。其次人民能够选举政治领导人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保证，工人中认识到这一重要性的人也比其他社会阶层（包括知识分子）比例高。

代表们如此与中央不合作，一般工人中的独立要求有多强是可想而知的。八九年五月在各地出现的工人组织都标榜“自治”两字决不是偶然的。

四

刚刚萌芽的独立工人运动，象学生运动一样，被中共当局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只要干部一下达阶级关系的实质不发生变化，希望组织独立工人运动的要求就不会泯灭。邓小平前几年多次表示他欣赏波兰的军管，但现在自己看到波兰军管的后果。他在对中国实行恐怖政治的后果，绝不会比波兰军政好。因为所有导致（九）年抗议运动的原因一个也没有消失，在寡头政治条件下也很难消失。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未来民主运动的目标和战略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现在谈民运的人，谈的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分子的运动。即使谈到要争取工农的支持，也只是着眼于借用工业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讲争取民主，但实际上要求的是“自由”（civil liberties）很少或从不提到广大工农群众关切的经济民主（shop-floor democracy）。同时，他们许多人热衷于“精英政治”。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并准备一旦掌握政权就在中国实行这一制度，很少或从未考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是否会接受这种社会制度。这样的“民主”到底会带来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如果说我们目标不很明确，很难产生出系统的、一唱有成效的战略。而没有能克敌制胜的战略，中国的黑暗就会持续下去；或者一个新的反对运动会星星起，把我们抛在一边。这两者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本场辩论已彻底改变；中国，一个极小的市会地位。三人当讨论所层二层东也说/也说/而被化，以往连些而中所谈的“议会”和“总统选举”等政治范畴已不复存在，介于两者之间，灰色地带已完全消失。人面对的是一丁点而已差别不同，甚至模糊不清。只有实践经受考验，才能判断谁优谁劣，谁对谁错。消除两个阶段的分歧，重塑合下关系。转型困难，
注释

- 17、18日：《经济日报》，1989年5月17、18、19日。
同上。
- 5、《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6月10、13、14、15、20、29日。
- 6、《侨报》，1989年5月30、31日，6月1日。
- 7、《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86年。
- 8、庄启东、袁伦渠、李建立：《新中国工资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86年，第174和181页。
- 9、徐海波：“中国企业的劳资关系——现状、分析及对策”，《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劳动经济与人事管理》，1987年第一期，第4—6页。
- 10、“工会十一大侧记”，《半月谈》，1989年第二十一期。
- 11、同注9。
- 12、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舆论调查室：“一九八七年以来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的调查分析”，《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五期，第50页。
- 13、《广角镜》，1988年12月6日，第46页。
- 14、萧诚臣、施勇峰：“牧歌与陷阱——中国失业问题的报告”，《报告文学》，1989年第四期，第15页；《了望》（海外版）1988年11月7日，第14页。
- 15、《经济日报》，1989年5月11日。
- 16、同注13。
- 17、《中报》，1988年8月30日。
- 18、同注13。
- 19、同注14，第18页。
- 20、《了望》（海外版），1988年5月23日，第13—14页。
- 21、同上。
- 22、同注13。
- 23、曹生德、王跃进：“实行劳动合同制好处很多，问题不少——对山西锦纶厂、榆次织布厂试行劳动合同制的调查”，《了望》（海外版），1988年10月24日。
- 24、施勇峰、萧诚臣：“面对失业困惑的中国工人”，《了望》（海外版），1988年9月5日；刘欣欣：“沈阳裁减三十万企业冗员”，《了望》（海外版），1988年10月24日。
- 1、《美洲华侨日报》（以下简称《侨报》），1989年4月28日。
2、《侨报》，1989年5月19日。
3、《侨报》，1989年5月17、18、19日；《人民日报》，1989年5月“撤恩”政府附属，而25、同注14。

老江湖演变为了一种江湖政治力量。只有灵魂政治民主才有可能
将虚假新闻的政治力量边缘化为虚说性活动。

1990年9月

- 26、引自 Aleksander Smolar, 'The Rich And The Powerful', 见 Abraham Brumberg编:Poland: Genesis of a Revolution, Random House, NY, 1983年, 第46页。
- 27、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舆论调查室：“一九八七年以来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的调查分析”，《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5期，第48—57页；张结风：“大陆社会心理混乱难题成堆”，《百姓》，1989年3月16日，第11—12页。
- 28、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国家统计局：“一九八八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人民日报》，1989年2月28日。
- 29、劳动人事部综合统计局魏九凌：“一九八七年职工工资增长情况简析”，《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劳动经济与人事管理》，1988年8月号，第65—66页；上引“一九八八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30、城市居民对物价改革态度的补充分析”，《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第33—36页。
- 31、同注27。
- 32、《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9月1日。
- 33、《天津日报》，1988年7月20日。
- 34、同注27。
- 35、同注26。
- 36、同注26。
- 37、《中共研究》，1988年，第十二期，第56页；中新社广州1988年11月4日电。
- 38、《九十年代》，1999年，第五期，第28页。
- 39、八六年我曾在武汉进行文革研究。我问被调查者，“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你们会参加吗？”他们都说不会。我换了一个方式向同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发动一个运动清算贪官污吏，你们会参加吗？”他们都说他们一定会参加。有意思的是，相当多文革中参加保守组织的说：“下一回，我们也要当造反派了。”
- 40、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组：“中国公民的民主观念——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系列报告之七”，《北京日报》1988年2月12日。
- 41、《（了望）》，1988年11月7日，第14页。
- 42、中新社南宁电，1988年8月25日。
- 43、同注13。

中国社会 各阶层政治意识分析

张 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从经济发展与政治意识之关系入手，分析八九民运期间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识及其结构，从而提出今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形成可能通过启蒙与联合来实现这一设想。

中国近十年来的政治经济改革，到一九八九年，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十年改革，无论多么有限和不足，毕竟带来了工、农、商等各方面的重大变化与发展。农业变化最为显著，基本上实现了制度方面的转型，原来的公社所有制消失了。工业虽然在体制和所有制改革方面并不成功，但毕竟对旧体制有所调整。如果把乡镇企业也考虑在内的话，其蓬勃发展则是前所未有的。商业相当活跃，在工农、城乡之间相互渗透。国民的流动性大增，信息的功能日益加强。但是，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可能产生保守的因素。¹ 这是本文将要论述的一个主题。

如果说现阶段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作一粗略的考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金字塔。在其顶端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紧接其下的是工人，而塔的主体则是农民。知识分子无疑是社会中最富有政治灵感、最有见解、最坚决的政治变革派，因为他们不属任何产业，受经济活动影响最小，因而顾虑最少。² 同时他们的职业特征一直使他们别有一种使命感。他们是历次政治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工人在中国则是一支独特的政治力量，他们集居在城市，进行任何城市政治改革都离不开他们。但是，中国的工人是相对保守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上的富有或贫困，而是因为他们的满足感。中国政府向